

評介廖建裕著「中共與東協：華人層面的研究」

吳新興
(澳洲墨爾本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書名：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The Ethnic Chinese Dimension

作者：Leo Suryadinata (中文姓名：廖建裕)

出版處及年代：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85.

頁數：二三〇頁。

一、前言

自一九八七年十月以來，馬來西亞政府派遣不諳華語的巫人進駐各華人學校擔任行政工作，引起該國華人的不滿與抗議，並進而導致最大反對黨民主行動黨副主席陳勝堯與秘書長林吉祥等人被捕的不幸事件。此一事件使得沉寂甚久的馬國種族衝突再度表面化並引起世人的關切。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高級講師廖建裕對於華人在東南亞的事務素有鑽研，並於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中共與東協：華人層面的研究乙書，該書對於東南亞尤其是東協各國的華人與當地住民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共對於當地華人的政策，以及華人對於中共和東協各國關係的影響等均有探討。相信經由該書作者深入的分析，有助於吾人對於目前東南亞華人的問題以及此次馬來西亞華校事件的起因癥結背景有所瞭解，這也是評介本書的主要用意。

本文將先簡介該書之大意，俾使讀者易於掌握該書之精神、重點和全貌，稍後並就全書之分析架構、參考資料與內容等分別予以評述藉收一氣呵成之效。

二、本書特色與內容簡介

(一)特色

誠如作者在本書序言中所指出的，以往有關海外華人的研究著作大多偏重於中共對於海內外的僑務政策，並強調截至一九七〇年以前此一政策在中國大陸內部而非外部的發展。

和其他著作不同的是，本書：第一，研究的範圍角度較為廣泛。它不但探討中共的僑務政策，也注重海外華人對於中共和東南亞各國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它也分析東南亞各國政府，尤其是東協國家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特別是僑務政策的反應；以及華僑在中共外交政策中的份量和華僑與中國的傳統關係。第二，在研究時間的涵蓋面上，本書強調自一九七〇年以後至現階段中共——東南亞國家——華人三角關係的演變與發展；因此本書應該算是近來研究海外華人的新著作。第三，本書最大的特點是作者以海外華人的身份，就華人對於「祖國」的認知，以及心路歷程的轉變現身說法。謹就此點，就值得關心海外華人情況的人士一讀了。

(二)內容簡介

該書共分爲六章，依序爲：

- (一)前言。
- (二)華人、中共與東南亞的共黨運動：一堆難題。
- (三)在北平的外交政策下的華人：國家利益對種族利益。
- (四)一九七六年前後中共的僑務政策。
- (五)東協與中共的關係：種族、安全或是權宜措施？
- (六)結論

第一章 前言

作者首先將「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這個名詞解釋爲：(一)居住在海外但仍持有中國(通指臺海兩岸政權)護照

的中國人；(二)已入籍各客居國的華人。他表示，中共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爲了「四化」需要開始極力籠絡海外中國人，並且將之區分爲：(一)「華僑」(住在海外的中共公民)；(二)「外籍華僑」(已入籍外國者)；(三)「港澳同胞」；和(四)「臺灣同胞」。

在本書中作者表示只採用「華人」一詞來泛指居住在東南亞的中國人，而不問其國籍與文化改觀的程度爲何。

作者表示，由於缺乏真正的人口普查(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汶萊除外)，東南亞究竟有多少華人則不得而知；惟依據一九八一年的亞洲年鑑顯示，東南亞共有一千八百多萬華人。其中泰國華人最多共有六百萬，馬來西亞居次也有四百二十多萬；印尼第三約有四百十萬。若是依華人佔各該國總人口的比例而言，則新加坡第一(七六·九%)；馬來西亞第二(三三·一%)；汶萊第三(二五·四%)；泰國第四(一三%)。

作者指出，由於中共逐漸活躍於國際舞臺，以及華人對於東南亞政經情勢的穩定與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華人的重要性已漸被承認。然而也因爲如此，東南亞各國對於華人與中共的關連也相當疑懼。作者表示，華人在東南亞人數衆多，且對該地區經濟頗有影響力，「因此往往受到重稅壓迫與歧視之苦；在此情形下，華人自會轉而尋求中國(北平或臺北)的保護。因此作者引述學者羅素(James Rosenau)的看法說，「在東南亞當地人的眼中，居於少數的華人被視爲潛在的第五縱隊，並且成爲當地共黨能否成功地將這些華人組織起來的心結。」

第二章 華人、中共與東南亞共黨運動

本章探討的是華人在東協各國中的情況；他們與北平和臺北的文化政治關連，以及他們和當地共黨運動的關係。

作者表示，有人曾經假設所有東南亞的華人都是一羣具有共通性質的團體，例如：(一)說華語並且心向中國；(二)華人多是做生意者；(三)華人和臺海兩岸政權以及當地共黨均有著密切的關連；(四)對當地政治則興趣缺缺；(五)華人很難被人同化，一旦身爲中國人，就永遠是中國人。但是作者經過對東協各國所作的個案研究後發現，華人並不像上述所說的如此均質化，他們彼此之間仍然有著差別，分述如下：

(一)印尼：作者指出，共有四百多萬華人，佔該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八。大多數的印尼華人多已入籍，並且會說印尼話。政治上，該國華人可區分爲親雅加達、親北平、親臺北與立場不明等四種類別；但大都是被動而消極的。經濟上，華人大多從事私經濟的工商貿易活動，影響力與可見度雖大，但若要全盤控制印尼的經濟則尚言之過早。

(二)馬來西亞：約有四百二十萬華人，佔該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卅三·一。作者認爲，大馬華人社團的派系十分複雜，政治上可區分爲A、B、C三組；A組的華人在政治文化上均認同中國；B組占了華人的多數，只關心「低姿態而且和貿易商會等有關的間接政治」；C組則對馬來西亞做某種程度的效忠，此組人數正在增加之中。經濟上，作者表示，華人人數比例較多，因此較印

尼華人有更大的影響力。以一九七五年來說，華人擁有並控制三七·五%的跨國企業，估計到一九八〇年會增加為四〇·一%。爲此，印、馬兩國已經開始採取防範措施，強調經濟「原住民化」的政策，希望藉以壓制華人，並擴大當地「原住民」擁有國家經濟的比重。

(三)菲律賓：約有華人六十九萬人，占該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五。作者指出中國人可分爲混血華人（認同非國）與華人兩種；而後者在融入大菲律賓文化的過程中有著程度上的差異。政治上，自中共與菲國建交後，親臺北的勢力便趨於式微。經濟上，華人力量龐大；例如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華人銀行便擁有四百五十六億披索的資金，約爲該國私人銀行總資產的百分之四五·四。

(四)新加坡：約有華人一百八十餘萬人，占該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六·九。作者將華人區分爲受英語教育和受華文教育等兩種類別。前者大體上均向本土與西方認同，並掌握該國的政治權力；而後者則大多親北平或是臺北。經濟上，作者認爲華人影響力雖強，但是新加坡的經濟國際化政策使得許多西方跨國公司的經濟力量也不容忽視。

(五)泰國：約有六百萬華人，占該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作者表示，泰國華人受到當地文化整合與同化的程度甚高，這點是和東協其他國家不同的。許多泰國領袖都有華人的血統背景。儘管如此，「種族」衝突在泰國依然存在，但規模則不如其他國家大。華人的經濟力量，特別是在曼谷，甚爲強大。作者認爲，華人控制了泰國大部份的私經濟，惟多數華人均已入籍泰國。

作者將「國籍」和「接受非華文教育」兩項作爲東南亞華人對於居住喜好及政治傾向的指標。研究結果發現，愈來愈多的華人已入籍東南亞各國，而不再心懷「祖先的土地」。而華人也逐漸願意接受當地的非華文教育，此舉將使得華人與當地社會更進一步地融合。

作者也將華人受到當地文化改觀程度的高低與否，用下列四項因素來評估：(一)華人口之多寡；(二)華人和原住民彼此間在宗教上相似點的程度爲何；(三)當地政府與華人和解的準備如何；(四)華人願意接受當地文化改觀的準備爲何。研究結果發現，泰國華人同化的程度最高，菲律賓和印尼次之，馬來西亞最低。作者指出，新加坡由於華人原本就是多數種族，因此與少數的「原住民」同化是不切實際的。新加坡華人雖然是中國人，但又和中國大陸、港澳、臺灣的中國人有著差別；因爲在本土意識上，許多新加坡華人已經自認爲是「新加坡人」(Singaporean)了。

作者指出，在新加坡英語的使用雖然日漸普遍，但是說華語的人口仍有相當的數量。這些人似乎在文化上的傾向更屬於中國人，而在政治上則仍是新加坡人。他們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寧可和臺灣、香港却不願跟中國大陸維持文化接觸。因爲如此，使得東協國家一些本土領袖們仍然視新加坡人爲「中國人」，並且認爲他們在政治上和中共或是臺灣保持聯繫。作者發現，新加坡的中國人形象經常爲它自己和那些猜疑華人的鄰國間產生一些問題；而新加坡的領袖們對此現象也非常敏感，並且一再重申他們也

是東南亞人，將只根據新加坡而不是別的國家（例如中國）的國家利益而行事。

在有關華人與當地共黨的關聯上，由於無人做過各國共黨或是種族成份的分析，因此作者表示並無明確的證據。據作者估計，馬來西亞的共黨人數為三千四百多人，菲律賓則在三、四千人之間，新加坡約有三百多人，而泰國也只有千二百人左右。其中由華人所支配的泰共、馬共與新共大多親北平，然而也有一些非華人所控制的共黨也是親中共的（例如菲共與緬共）；因此作者認為過度強調華人參與共黨的程度會使事實真相不明。此外，很多華人也是反共的，例如馬來西亞的「馬華公會」，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等。

第三章 在北平外交政策下的華人：國家利益對種族利益

在本章中，作者探討的問題是中共允諾護僑的程度究竟如何？以及是否願意犧牲其內部的考慮而來全力護僑？

作者首先分析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外交政策的五個主要目標：(一)追求國家的安全；(二)維護領土完整（包括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統一）；(三)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四)致力達到強權地位；(五)實現中共在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中的勝利。而這五個目標都是相互關連的。

作者指出，由於中蘇共在六〇年代末期發生武裝衝突後，中共一直擔心被蘇聯所倡導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所包圍；換言之，中共仍然擔心自身的安全。因此，東南亞地區對於中共的安全就顯得益為重要。於是中共在一九七〇年代成功地和馬、泰、菲三國建交，而官方要員（包括鄧小平和趙紫陽在內）也為了抗衡蘇越共在此一地區的活動而先後訪問了東協各國。

作者表示，在中共的「國家利益」觀念中是有著高低優先順序的，當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高優先權）和意識形態（低優先權）發生牴觸時，前者往往會佔上風。同樣地，如果國家利益和僑務政策相牴觸時，後者往往也就成了犧牲品。作者就下列三個個案分析來證實其看法：

(一) 印尼排華事件：一九六〇年，印尼政府規定非印尼籍華人不准在鄉村地區從事零售業，同時也禁止這些華人在西爪哇居住。這些規定明顯地剝奪了當地華人的生存權，也引起了中共的干預與抗議。中共開始派艦艇至印尼撤僑，根據印尼資料顯示，約有十萬華人離開印尼返回中國大陸。

在此同時，印尼軍方反北平勢力開始逐漸抬頭；另一方面，蘇聯也藉著軍援和支持蘇卡諾的「解放西亞利安」運動而影響力日增。此外，大量歸僑也為中國大陸製造了問題，而歸僑本身也無法適應「社會主義祖國」的生活從而產生了社會位置錯亂的感覺。最重要的是，中共基於害怕失去盟邦的心理，而終於停止了撤僑行動並結束此一事端。

從此以後，排華運動在印尼便定期發生，而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兵變使得問題再告複雜。印尼軍方懷疑中共和華人均涉入兵變

陰謀，而中共也對印尼的反新政權相當敵視；於是新的反北平、反華人運動再告發生，中共又派艦撤僑四千餘人。儘管如此，中共爲了顧全其東南亞全盤策略的影響，決定低調處理印尼的華人問題，以維持中共——印尼關係的和諧。而在爾後的動亂中，例如一九七三年的萬隆暴動、一九七四年的雅加達事件、以及一九八〇年的蘇拉卡達暴動，中共的官方刊物報導均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二)中共在一九七五年高棉陷共後的僑務態度。據作者研究發現，棉共奪權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計劃，許多城市華人被迫上山下鄉墾荒勞改；華人子女被迫和棉共幹部軍人通婚；華人乃大量逃往鄰近的泰國避難。據說在泰國境內二省的四萬名難民中，華人便占有百分之二十。中共惟恐損及中棉共的新關係，以及擔心稍後蘇越共聯手所形成的包圍態勢，對於上述華人的困境慘狀不但不予理會，反而與波布政權聯手對抗蘇越共。因此作者認爲，在國家安全的優先考慮下，北平並不願意爲了華人問題而與棉共發生爭執；中共政治層面的考慮遠較僑務政策來得重要。

(三)華人與中越共的戰爭。作者分析認爲導致一九七九年中越共戰爭的因素很多，它包括了歷史的因素（中國人素視中南半島爲其勢力範圍）；中蘇共的對抗；中越共之間的領土糾紛；意識形態的分歧等。而同時發生的越共驅華事件並不是戰爭的主因，華人因素只是在業已敵視惡化中的中越共關係上傷害了北平的自尊而已；尤其是在當中共剛剛宣佈了新的僑務政策以後。這也可解釋爲何中共專挑越南而不是高棉的華人做爲保護的對象。

然而，作者表示，中共的「教訓」越南並無助於當地華人困境之舒緩，反而使得華人和越人之間彼此仇視，單單在一九七九年四至八月之間，中共便收容了二十五萬華人難民。

作者總結上述三個案例後表示，中共的僑務政策乃是隨著不同的時期與不同的當權者態度而轉變的。雖然政治精英有意「護僑」，而「國家利益」的優先考慮却又凌駕於一切之上。因此作者指出，中共的護僑措施是有限的。換言之，就保護海外華人的利益而言，中共是無能爲力的，華人仍然只有指望當地的政府來保護了。

第四章 一九七六年前後的中共僑政

華僑住在中國大陸的，中共分別稱爲「歸僑」、「僑眷」和「僑生」，而總稱爲「國內華僑」。根據廖承志在一九八一年所宣稱的，「國內華僑」約有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作者認爲此一數目爲了政治目的或有誇大之嫌。

作者表示，在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之間，中共大體沿襲國民政府的政策，視華人爲中國國民，鼓勵華僑返國投資定居，辦僑校、建僑村等。爾後，北平開始懷疑華僑對「祖國」的忠貞度，以及擔心因華人問題而傷害其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自一九五七年起，便逐漸修改僑務政策，鼓勵華僑入籍當地國，接受當地語文教育等。作者指出，中共認爲此一政策可以有效地改善其與

東南亞各國之關係，又可免除擔負華僑問題之困擾。在中國大陸，歸僑不再享有特權，一九五七年公布的「平等待遇」政策即為明證。「文革」期間，歸僑之境況更為淒慘，往往成爲鬭爭迫害之對象，並被封以「走資派、寄生蟲、間諜、反動份子」等罪名而鋤鐮入獄。「文革」前的僑政也受到批判，「僑務委員會」也被迫關閉。因此，作者引用香港明報月刊的統計顯示，在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之間，中國大陸約有五十萬名歸僑，但是在一九六七—一九七二年間却有四十萬人失望地離開了中國大陸。

自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以後，作者指出，中共有感於「四化」工作對於人才、資金的需要，乃再度開始向華僑示好。在對待歸僑方面，中共將往昔的錯誤諉過於「四人幫」，並表示將會保護歸僑的利益。在對待海外華僑方面，中共說華僑已入籍他國者，「仍是我們的親友」；並呼籲海外華僑組成一個「廣泛的海外華僑愛國統一戰線」。

中共上述新政策，作者認爲只是重回「文革」前的老路子罷了，但是在中共的內政上仍具有雙重含義：(一)它表示北平容忍某些「資本主義」的成分存在其「社會主義」社會的內部；(二)中共似乎有意容忍那些在未來會引起團體衝突，而具有「自成一體」色彩的「歸僑團體」(意指歸僑在生活習慣與生活水準上較難與中國大陸同胞融和而產生隔閡)。

此外，在對待海外華僑方面，作者認爲，新的政策可被解釋爲鼓勵華僑保存對自己文化的認同，並反對目前東南亞各國所實施的同化政策。一九七八年，「文革」時被解散的「歸僑聯誼會」(僑聯)和「僑務委員會」(僑辦)相繼再度成立。「僑聯」的工作對象較偏向於歸僑；而「僑辦」則爲僑政決策單位，兼顧海外華僑和歸僑兩者。一九八一年六月，胡耀邦甚至明言，僑務工作政策的指導原則就是爲了「保護並激發同胞熱愛祖國的情操。誰要是限制此種熱情便是反對黨的政策。」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公佈了第一個「國籍法」，該法兼採屬人與屬地兩種原則。作者表示，該法產生的背景有二：第一，新法具有釐清華人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尊重東南亞各國的國籍法，並促進中共與東協各國間友好關係的效果。第二，鄧小平一九七八年的東南亞之行，深感當地華人並不自認是「華僑」，而是東南亞人，因此制定此一新法，具有向事實認同之意。作者表示，中共的新國籍法釐清了當地華人國籍歸屬的困擾，因此華人大多歡迎此一法律。

第五章 東協與中共的關係：種族，安全或權宜辦法？

作者在本章中從東南亞人的觀點來檢討中共與東協六國的關係：

(一)馬來西亞與中共關係。雙方於一九七四年建交。中共承認大馬華人的單一國籍；也同意不干涉馬國內政，與不搞顛覆活動。但是中共堅持爲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理由，仍想維持與馬共的關係。作者認爲，如此當時機適當時，中共可藉著共黨的力量對當地政府施壓。儘管如此，馬國了解，只要中共期盼有個好鄰居時，中共對於馬共的支持就必須有所節制。

(二)菲律賓與中共關係。作者表示隨著美、中共關係的和解，菲國領袖認爲該國的安全不能只靠美國，也必須依賴中共和蘇聯

。兩國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建交。除了華人國籍問題順利解決外，馬可仕總統並不擔憂中共會大力支持非共，因為和馬來西亞的看法一樣，中共必須顧忌當地政府的反應。

(三)泰國與中共關係。作者指出，泰國與美國的外交步調是一致的。當美國與中共和解時，泰國也擔心河內政權和赤色高棉的出現會對其國家安全有所威脅，而在一九七五年與中共正式建交。中共承認單一國籍的原則，但却拒絕切斷其與泰共的黨對黨關係。

(四)新加坡與中共關係。作者認為新加坡未與中共建交，其主要原因為：(1)由於華人占大多數，此一事實使得東協鄰國疑懼新加坡會變成「第三個中國」，或是中共在東南亞的前哨站。為了掃除此一形象，李光耀總理表示惟有等東協各國全部承認中共後，新加坡才會考慮與中共建交；(2)新加坡擔心與中共建交後，會引起華人的沙文主義，導致內部種族不安；(3)不願影響現存而密切的新加坡與臺北之關係；(4)新加坡對於中共堅持和東協各國共黨維持關係也感到不安。

儘管如此，作者表示，新加坡却在一九八〇和中共簽署了一項貿易協定，也在高棉問題上與中共看法一致。因為新加坡視蘇聯之擴張為一大隱憂，而不像印、馬兩國視中共為主要威脅。李光耀總理認為中共落後美蘇超強廿年，而中共在未來與風作浪的能力也僅「只局限於煽動支持共黨游擊隊叛亂和直接鼓噪華人惹事生非而已」。

(五)印尼與中共關係。雖然印尼早在一九五〇年代便已承認中共，後來由於華人問題，以及一九六五年的流產兵變，導致雙方關係在一九六七年中斷。印尼目前仍然擔心若與中共復交後會讓印共活動死灰復燃。而商界和回教人士更擔心與北平關係正常化，華人的歸化過程將會加快，從而加強華人對於經濟的控制，而犧牲掉回教商人的利益。

此外，作者也表示，親臺灣的力量在印尼仍然強大，印尼與臺灣的雙邊貿易額在過去十年中成長迅速並且超過了印尼與中共的間接貿易額。此外，臺灣在印尼的投資在一九七九年也多達美金一億一千萬元。因此作者認為，印尼的領導階層，不論是從政治或經濟的觀點，目前仍主張與中共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六)汶萊華人與中共。汶萊係於一九八四年脫離英國獨立而加入東協的。華人共約四萬人，占該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估計其中三分之一華人業已入籍汶萊，其餘華人多屬無國籍者。作者表示，若依中共「國籍法」屬人原則，北平似可視這些無國籍但是有中國人血統的汶萊華人為其國民。然而，中共目前似乎無此意圖。作者認為主要原因乃是汶萊人民目前生活富裕，每人每年總生產毛額高達美金二萬元，其內部也頗為安定，外來陰謀勢力便無機可乘。

第六章 結論

作者在本章中指出了東協調整其與中共關係的原因為：(一)國際局勢的演變；(二)中蘇共的分裂；以及(三)美中(共)關係的和解

。而中共的支持東協各國共黨叛亂，以及它的東南亞僑務政策也制約了東協與中共的雙邊關係。作者認為，儘管許多東協國家自信可以控制各該國的共黨叛亂（在沒有外力大量支援的情況下），但是只要北平愈支持共黨，東協國家也就愈加敵視中共。

作者表示，雖然中共一再重申無意干涉各國內政，而且僑務政策也將維持不變，但是東協仍然戒懼中共的意圖。在未來，華人問題仍將會是東協與中共關係爭論的因素。

華人問題和其他因素又如何影響中共與東協的關係呢？作者指出，許多華人，尤其是東協各國，對於政治的立場是相當務實的，他們了解到自身的安全與成功是依靠居住國而不是北平或臺北。他表示，大多數的華人都已經歷過「東南亞化」(Southeast Asianization)的過程，而在情感上更傾向於自己所誕生和居住的當地國，中共若企圖利用華人來達成其目的似乎是不大可能成功的。

中共領導階層對於僑務的看法也未盡一致。因此作者認為，只有當中共的僑政和「國家利益」、經濟發展以及對臺灣統一等優先政策相配合時，中共才會考慮保障華人的利益；否則的話，僑胞往往變成其他優先政策下的犧牲品。

東協各國華人和中共的關係也因為主客觀情勢而有所不同。作者表示，在意識形態上，中共幾乎是毫無吸引力的；在文化上，中共似乎仍是部份華人文化的泉源，但是香港和臺灣似乎又比中共還有吸引力。儘管如此，作者却強調調說，許多華人却更熱衷於當地和西方的文化；而中國文化，尤其是華語，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政治和社會文化的原因，也使得華人逐漸溶入當地的社會中。

作者在本章末尾表示，中共經常利用華人的情感來為其利益服務，諸如滙錢及在中國大陸投資等；然而過去的事實顯示，此種方式似乎收效甚微。他說，只要東協各國繼續其務實的政策，並且誠心的將華人視為其新國家建設的一部份，那麼華人的本土化傾向和意願將會繼續下去。果真如此，則中共利用東南亞衆多華人的可能性將微乎其微了。

三、結語

如前所述，本書的特點係從東南亞華人、東協各國以及中共外交政策的範疇來探討華人、中共、東協三者之間關係的互動與影響情形。研究的層面也較為廣泛，遍及東南亞地區，尤其是東協各國，提供了一個較為全盤而完整的概念；這也相對地彌補了過去一般研究該地區華人問題之學者們只側重某一特定國家或問題所做的局部性探討的缺憾，或許這是該書最大的優點。然而，相反地，廣泛而無法深入可能也是該書的弱點；茲稍加評析如後。

(一) 文章架構部份

全書包括前言與結論在內共有六章。在前言中，作者將一九七八年，中越共爲了華人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作爲研究動機之起因，並且將「海外華人」一詞加以詮釋以有別於中共自己的定義。此外，作者以華人是否是中共潛藏在東南亞地區的「第五縱隊」爲楔子展開了全文之探討，方法簡捷而有力。第二章作者分析了華人在東協各國中的不同情況，以及渠等之文化、思想觀念。第三章則側重在分析華人與中共的「國家」利益，及其在中共外交政策中所具有的份量。第四章是探討中共歷年來的僑務政策。第五章則從東協國家的觀點來看中共與該地區的關係。第六章則爲結語及評估。

由於本書研究的國家對象甚多（包括東協和越、棉共計八國），因此作者係採「個案研究」的途徑，來說明各國——各國華人——中共三邊的關係；第二、三、五章的運用至爲明顯。事實上，東協及棉、越等八國內部華人的人數，以及佔各該國總人口的比率均大不相同，因此在處理種族問題的態度上，以及和中共的關係上，也自是緩急不一，看法互異。儘管如此，作者却從客觀情勢的相異，而歸結整理出了共通一致的研究結果，亦即：(一)華人在制約或促進中共與東協國家的關係上，仍然可以發揮一定程度之影響力；(二)不論中共的僑務政策如何美好，「但是當該政策與其『國家』利益相抵觸時」，僑務政策也就蕩然無存，而華僑權益則被忽略或是犧牲；(三)華僑「終將依賴當地國，而不是北平或臺北」來保護他們；(四)華僑的「東南亞化」過程，終將使得該地區的華人逐漸與本土認同，而不再心懷「祖先的土地」。

綜上觀之，作者經由個案研究之途徑，不但個別顯示了每一東協國家——華人——中共三邊關係的情形，但也獲致了作者本人的研究結論，因此大體而言可說是一個甚佳的研究方法選擇。

(二) 參考資料部份

作者參考了十四種各國的期刊和報紙；以及七十九位中外學者一〇七種有關此類問題的研究著作。鑒於海內外專研華人問題的學者專家原就不多，相對地有關此一方面的著作出版品也就比較缺乏，作者能夠搜集並參考上述一百餘種的資料，誠屬難能可貴。而的確世界上幾位著名的華人問題專家學者，諸如新加坡的李勵圖、香港的王廣武，以及澳洲的費滋諾（Charles P. Fitzgerald）的著作，均已在本書參考書目之內。

本書的另一特色便是作者搜集附錄了十七件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於華人（或華僑）政策、法律或行政命令的第一手資料，諸如：(一)「華人國籍的取得與喪失法（一九〇九）」全文；(二)「中華民國國籍法（一九二九）」全文；(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一九八〇）」全文；以及(四)「一九五五年四月廿二日「中共——印尼雙重國籍條約」全文等等。相信這些資料對於有心想更進一步

步了解東南亞華人問題的讀者，當可提供認識與研究上的便利。

(三) 內容方面

作者在前言中，首先明確地將「華人」界定為泛指居住在東南亞的中國人而不問其國籍與文化改觀之程度為何，以別於中共的說法，具有正本清源，釐清本書探討客體之意。此外作者簡介了東南亞華人的分佈情形，以及渠等對於中共和東協關係的影響與意義後，展開了全書之探討，起步甚佳，簡捷有力。

在第二章中，作者將討論的重點放在：(一)華人口在東協各國中的不同情況；(二)他們與北平和臺北的文化政治關連；以及(三)他們和當地共黨運動的關係。這是一項引人興趣的討論。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在第一部份用個案敘述的方式，却重覆探討了兩項相同的問題：亦即華人在政治上的態度，和經濟上的影響力等，內容稍嫌繁冗，如果能夠改採綜合比較的方法，或許效果會較佳。此外，在有關華人和當地共黨組織的關連上，或者因為有關資料搜集不易，作者並未對此作深入的發揮與分析，簡略帶過甚為可惜。

在第三章中，作者指出中共往往將自身的利益置於東南亞華人之上的看法，是精闢與獨到的。他認為中共由於政治層面的考慮，往往會犧牲華人的利益，因此中共並不會真正地爲了華人的問題而與他國發生爭執。此種洞察力，無疑是點破了中共「僑務政策」的功能有限性與爲統戰而服務的本質。

作者在第四章中粗略地探討了自一九四九到一九八〇年間中共僑務政策的演變過程；並把重點放在「文革」結束（一九七六年）之後。由於涵蓋的時間甚長，而在篇幅有限的情況下，作者將「文革」之後，中共僑政的轉變主要歸因於「四個現代化」的需要海外華人的精力、物力與財力。但是對於新僑務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共內部的看法，以及它在現階段所代表的意義等却未做進一步的說明，使人無法明白究竟有何不同。而新政策會否影響東南亞華人今後對於臺海兩岸政權的看法與支持，作者也未表示意見，甚爲可惜。

在第五章中，作者用個案研究的方式，歸納出東協各國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與中共和解的原因爲：美國在越戰中的挫敗，並帶頭與中共和解；中共擔憂東協落入蘇聯的影響力範圍而有所回應等兩大因素。然而由於和解的原因大多相同（新加坡與印尼除外），因此在敘述個案實例之時，難免就有重覆雷同之處；且由於討論對象甚多，也只能點到爲止，無法深入分析，誠爲美中不足。

結論時，作者對於中共護僑的心意與能力抱著不太樂觀的看法，並認爲東南亞華人隨著時間的轉變，以及華人「東南亞化」的影響過程，終將使華人「本土化」的傾向持續下去，而逐漸忘掉「祖先的土地」。作者似乎忽略了目前臺海兩岸，政經社會層

面的快速轉變與發展，對於東協國家可能造成的經濟與文化的影響。

綜上觀之，本書在探討東南亞華人——中共——東協三角關係問題上，業已提供了相當程度的敘述與分析。結構嚴謹，資料取材豐富，論點多有獨特之處，雖偶有繁冗重疊，惟鑒於本書討論層面之廣博，已屬難能可貴。

本書最爲可貴之處在於作者以身爲東南亞華人之立場，對於當地華人之處境、政治觀、以及彼等對於臺海兩岸政權的僑政等做了切身而耐人尋味的剖析；無疑地，這也增添了本書的可讀性與今後臺海兩岸制定僑務政策時的啓發性。廖氏的著作提供了我國今後僑務政策思考的張本。

「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恭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國內——（郵掛）新臺幣十二元
國外——平郵 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〇〇〇三四三六——二號